

《周易》符号阐释中的元语言规则

苏 智

(浙江音乐学院 公共基础部,浙江 杭州 310020)

摘要:《周易》文本的符号阐释具有无所不包的性质,这也使其在实际的卜筮中可以为不同事物提供合理的预期。在对《周易》这一特征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发现,阴阳是其表意中最为基础的符号,其他符号通过阴阳的组合形成了体系更为复杂的层次。阴阳符号的阐释范畴直接关联事物特征中的纯粹本质,并影响着其他层次符号组合的意指关系。同时,《周易》的符号属于弱编码,这就加大了符号衍义的巨大信息量。元语言在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影响使阐释更为复杂,符号意图定点的确立在充分考虑系统规则的基础上也受到时空语境因素的限制。

关键词:《周易》; 阴阳; 符号; 元语言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382(2016)06-0016-07

《周易》这部实用性极强的占卜著作自古便用于事务的吉凶预测。朱熹曾说“其他经,先因其事,方有其文。如书言尧舜禹汤伊尹武王周公之事,因有许多事业,方说道这里。若无此事,亦说不到此。若易,只则是个空底物事。未有是事,预先说是理,故包括得尽许多道理。看人做甚事,皆撞着他。”^{[1]1631}这也是《周易》之所以广为流传并被奉为经典的原因。要研究《周易》的表意,很有必要分析一下《周易》的元语言规则如何保证多元阐释的有效性。

一、阴阳作为根源符号建构的意指系统

《周易》中的符号来自于观物取象。《易传》中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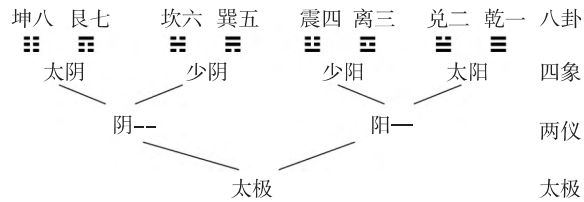
物宜,是故谓之象。”^{[2]265}圣人作《易》时,先从自然之中获取信息,建构出由卦画符号所组成的象来判断吉凶祸福。从最基本的卦画符号——爻画来看,《周易》只有阴爻和阳爻两种表现形式,正所谓“易只一阴一阳”。《周易》的基本法则认为一切事物的存在和变化都出于阴阳及其变易。

阴爻和阳爻两种符号是《周易》的表意基础,也是意义层次进一步建构中的分子构成。爻画即是独立的被阐释对象,同时也构成系统,并在系统中呈现出不同的吉凶状态,影响着卦象的整体表意。“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2]275-276}这一规则在邵雍《皇极经世》的先天

收稿日期: 2016-10-27

作者简介: 苏智(1987—),女,辽宁沈阳人,文学博士,浙江音乐学院讲师,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主要从事易学符号学研究。

易学图中阐释得最为清楚^{[3]134}。



此图展现了通过爻画的层次叠加来组成卦画以呈现吉凶之象的过程。《周易》总共有六十四个卦画,这些复杂的卦画组合通过各种方式的变化和多角度的阐释,对万事万物的“吉凶”作出预测。每个卦画由八经卦中的两卦叠合组成。“太极”即太一,指至大的浑然一体的宇宙世界,“两仪”即是阴阳交替运动变化的两大法则^①。八经卦是在四象——太阴、少阴、太阳、少阳的基础上添加一个爻画组成。四象就是阴爻与阳爻两两互组所形成的符号变位。进一步分析可见,所有的卦画符号和次级符号的根本点都归结为两仪所指称的阴爻与阳爻这两个基础符号。最终,邵雍把阴阳两仪同归于太极,太极也就是阴阳未分之前的混沌状态。无独有偶,皮尔斯也认为,“太初”是一种没有时间也不可描述的“混沌”,但最好把它理解为一个由感觉和众多彼此不相关的“发生”所构成的“混沌”^{[4]109}。总之,阴阳两仪是区分混沌的开端,阴爻与阳爻符号既是意义的原初分节,也在结构的最低层次上对整体意义作根本性统摄。陈良运先生同样也认为,卦象是将自然变化中的抽象规律具象为观念符号,由观念符号组合出揭示吉凶的卦象,再由卦象生发出各种精神意义而定大业。“立象以尽意”抽象出阴与阳两个基本的观念符号。“设卦以尽情伪”则是阴阳符号分别组成了八经卦,进而构成《周易》的六十四卦。“系辞焉以尽其言”是对卦画符号的意义进行新一轮的阐释和生发,在易传中进行显义或隐义的多义组合。“变

而通之以尽其利”,在形而下的基础上发掘出符号中的实用意义,而“鼓之舞之以尽其神”则在于说明符号形而上的精神意义^{[5]58}。

运用现象学理论分析《周易》卦画符号的意义形成,则会发现卦画意义的融通,具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过程。圣人在对世间万物进行本质直观后,运用一种抽象的思维把万物的特点归结为阴与阳两种性质,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过程。托姆认为,图式是对于实体之间基本的时空相互作用的抽象再现。阴阳爻是对事物和宇宙原理的最初认识,从单纯的物象上升到各种事物的本质特性,对本质进一步抽象而形成了种属类别,最终也将世界的纯粹本质抽象为阴与阳。《易传》中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2]251}可见,在《周易》的符号分节中存在着乾坤、贵贱、刚柔等一系列二元对立,每一种对立都是对相关事物进行观察和思考之后得出来的结论。从天地之间的对立,圣人感受到了其中的性质差异,将其抽象为乾与坤两种不同的概念。从高山低谷的空间对峙感受到自然与社会等级间的同构关系,从而认为贵贱分明的等级制度是效法天地自然,证明了社会关系的合理性。从物体的运动与静止中,圣人同样看到了物理间的能量变化带来的一系列效应,总结出了刚与柔两种不同事物属性。但圣人并不满足于于此,而是从乾坤、贵贱、刚柔等一系列本质属性中再次抽象出了更为纯粹的本质,也就是阴阳。无论针对何种二元对立的观念,我们都可以将其中最根本的主导因素归因为阴与阳之间的对立变化。

在抽象出阴与阳两个符号之后,《周易》文本中的一系列复杂的卦画组合便在阴阳意义的基础上表达世界的多样性,其中的符号之间的排

①祝东.符号学视域下的易学元语言研究[J].符号与传媒,2016(1).

列与联系也反映了数学规律中的合理性。四象符号是阴阳符号的两两组合,八卦在四象的基础上添加一层阴阳符号,六十四卦又是将八经卦之间所有的排列组合都囊括了进去。因此,在符号的不断叠加构成中,符号所指示的意指对象也经历着这种关联变化。虽然符号的对象可以伸展到各个领域内,但是符号所代表对象的性质无不在阴与阳两类意义范畴的控制之内。胡塞尔认为“任何事实都包含一种实质性的本质组成因素,任何属于包含在其内的纯粹本质的本质真理都必定产生一种法则,所有的单一事实都受此法则约束。”^{[6]95}这样,生活中不同性质的具体事物之间相互组合的诸种可能也就在《周易》的卦画符号中得到应有的体现。《周易》通过阴阳爻符号的排列、经卦的组合,以及错综繁复的卦位变化将现实生活中的各类事物都纳入了符号的统摄之下。“圣人作易之初,盖是仰观俯察,见得盈乎天地之间,无非一阴一阳之理。有是理则有是象,有是象,则其数便自在这里。”^{[1]1646}故而,《周易》的卦画符号在数理和卜筮方面实现了合理化与完备化。

从另一个方向上来看,在《周易》的表意中,一切原型之源是阴阳符号。要将万物按照性质特点归类到不同的符号属性中,从而在《周易》符号的解读中得出合理的阐释,这是符号表意形成过程中由意识主导的一个自上而下的规约过程。由具体物象出发抓住本质,再由纯粹本质的符号——阴与阳来进行符号再现,从事物的某一方面出发进行符号指代,这也体现出符号表意的片面性。《乾》卦纯阳,《坤》卦纯阴,是阴阳对比的极端体现。《乾》卦以龙为喻,孔颖达认为,《周易》卦辞中的龙指的就是阳气,龙灵异于他兽,可潜则潜,可见则见。《坤》卦以牝马为喻,韩康伯注《坤》卦说“马在下而行者也,而又牝焉,顺之至也。”^{[2]31}也就是说,《乾》卦取龙之升

腾变化,《坤》卦取牝马的下行和顺。可见这种分类和比喻实际上关注的是事物与符号性质相关的一个侧面。又如,《说卦》中论到《乾》卦时,首先就说乾为马,又说震为龙,那么八卦的类属似乎就出现了混乱。之所以乾可以表示马,所取的是马具有动势而行地无疆的特点,与《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品格相通。龙能兴云致雨,自然就和《震》卦的雷象关联。因此,符号本身的意义指向是确定的,事物是用自己的一方面特点来关联符号的意义。但事物本身是丰富完整的个体,具有多维度的侧面。至上而下地将符号意义与事物的某个侧面结合,从而对具体事物按照其某种特征进行类属划分,固然可以保证从符号阐释中得出一定的意义,同时保证了事物与符号结合出一种整齐美观的形式,但其中也必然存在模糊与牵强的成分。如《说卦》中说“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2]308}《正义》是这样解释的“‘坎为豕’,坎主水,豕处湿污,故为豕也。‘离为雉’,离为文明,雉有文章,故为雉也。‘艮为狗’,艮为静止,狗能善守,禁止外人,故为狗也。‘兑为羊’,兑,说也。王虞云‘羊者,顺之畜,故为羊也。’”^{[2]308}上述解释虽然也可以自圆其说,但为何选取此一事物的此方面而不选取其他事物?从这个角度上讲,这种关联并不一定是必然的。但根据事物的性质采取这一系列分类后,《周易》的符号便可在针对具体事物的阐释中畅行无阻了。因为卦画符号的意义是范畴指向的,阐释的元语言压力必然使事物的某一个方面性质与之对应,以便融入《周易》的意义阐释系统之中。

阴阳符号是从万物的本质特征中进一步抽象出来的更为纯粹的本质,因此阴阳包含了万物之性,万物皆有阴阳之分。阴阳是万物存在的基础,又从根本上对世间万物进行统摄,自然可以无所不包。《系辞下》云“其称名也小,其取类

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2]294}但正因如此,阴阳符号过于抽象,以至于与具体事物在意义指涉之间已经有了一定的距离。符号相对于客观存在的事物具有更明显的片面性。也即,符号之所以是符号,只是因为要表达意义^①。概念越抽象越具有包容性,但也就牺牲了自身内容的丰满性,而逐渐简化为空泛的概念。所以说,《周易》符号具有“空”的性质。朱熹也曾说过,易只是个“空底物事”,这正是《周易》符号可以阐释一切的秘密所在。禅宗讲究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老和尚常常打哑谜,从一句看似无甚关系的话中让人悟出个中道理。一句有禅味的话可以让人联想许多,感悟出深刻的人生道理。其实,这与《周易》符号的阐释方式是一样的。卦画符号只是通过几条或断或续的线段排列而成,即使对爻画的阴阳意义有所了解,若不通过卦辞以及《易传》的一系列指引,恐怕还是难以把握这些符号的表意重点所指为何事物。即便卦辞等为其划出了一定的意义指涉范畴,卦义的阐释还是具有极大的阐释空间。符号与其表面的指涉物之间不具有紧密的联系,而只逐渐被解构为一个空泛的形式。因其空泛,故而解释者必然在元语言的压迫下在其中放入各种意义。形式本身看似最无意义,则其所指也就不会执着于被一个与事物密切相关的方向所指引,而是具有高度的发散性。“此所谓理定既实,事来尚虚,存体应用,稽实待虚。所以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万事无不可该,无不周遍,此易之用所以不穷也。”^{[1]1683}

二、无限衍义与多层次的元语言规则

《周易》的复杂性不仅体现于其符号意指的包容性上,同时《周易》符号阐释过程中的无限衍义和多层次的元语言规则也是其得以完成表

意的重要因素。符号的衍义规则与阐释中意义多变的复杂关系也促成了《周易》符号弥纶天地的阐释效果。

元语言反映了符号文本的表意规律特征,一般说来也就是文本的符码结构。在符号表意中,控制文本形成时的意义植入的规则,控制解释时意义重建的规则,都称为符码^{[7]224}。符号文本的形成首先是一个编码的过程,解释主体对文本的阐释则是对文本的一种解码。按符码的性质可以将文本划分为强编码文本和弱编码文本。所谓的强编码文本是指词典或电报密码这一类型的文本,这些文本要求阐释必须达到编码者的意图定点,不允许解码者过度阐释,否则得出的意义结果就是失效的。相反,弱编码文本对意义结果没有强制规定,往往是解码者自圆其说便可作为有效阐释,为解码提供了极大的意义空间。《周易》的符号文本虽然往往强调圣人之意,但从其符号的编码性质来看,它依然是一部弱编码文本。“刚健”与“柔顺”都只是一种质的可能性,而不必然是现实性或规律性^②。正如上面论述中所提到的,《周易》表意符号自身具有一定的意义范畴,并在某一方面的特性上与对象的某种片面性质相联系,从而将对象分类并囊括于符号的意义范畴之内,为意义的方向提供指引。仍以《说卦传》为例,“乾,健也。……乾为马。……乾为首。……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乾主刚健,乾为马是因为马的运动性强;乾为首是因为乾代表天,天在上,在人体上就对应头部;乾为圆是因为天圆地方,乾为天也就同样是圆的象征;乾为君是因为君权天授,君德要秉承天德,龙象也是帝王的象征;乾为父也是因为父权至上,且父权与君权本一体相通。也就是

①苏智.《周易》符号系统中的表意三分关系[J].符号与传媒,2016(1).

②王俊花.以三为体,以阴阳为用《易经》与皮尔斯现象学[J].符号与传媒,2016(1).

说,乾所对应的这诸多事物的某一片面的特性与《乾》卦的意义范畴相关,故而可以划归为一类。这使阐释具有发散性,为符号解码留下余地。《周易》文本的这种弱编码性,造就了其符号阐释的多向性,这也是其分岔衍义乃至无限衍义形成的重要因素。

宋代的陈骙在《文则》中曾言“《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也,可无喻乎?”^{[8]7}《周易》利用卦象符号来表达意义,这和《诗经》中运用比喻来传达情感是一样的。朱熹在解释《诗经》赋比兴时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9]4}正如《关雎》的开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起到的就是比兴的作用,先以鱼鸥水鸟的鸣叫来起兴,同时又以坚贞的鱼鸥比喻君子淑女高洁的情感,奠定了《诗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基调。以“关关雎鸠”为比兴,实际上也起到了立象尽意的效果。即通过河洲间水鸟鸣叫的意象进行联想,给予了思维极大的想象空间。《诗经》中的比兴同样是一种弱编码符号,在作用上与《周易》的卦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一般也认为《周易》的符号表意是一种诗性的表意,意图定点具有开放性,言有尽而意无穷。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弗朗索瓦·于连曾说“诗的言语使思维的进程改变方向,而不是强压,它轻轻地蜿蜒而行。它并不提供确定、清晰的意义,它以弥漫的方式向它激励的情感显示,而不是以指令方式指名道姓自我表现。因为它并没有固定的内容(终止的、滞结的,但也表现任意什么锋芒的内容),它同样不可能遇到抵抗,依靠其灵活、散漫的无限的流程而侵入意识:这样它能够偷偷地左右意识的方向——但是以更加全面、连续因而也就更加有效的方法。”^{[10]58}正是因为诗性表达具有灵动迂回的特点,使《周易》符号的表意可以依据解码者

的不同直观感受和思考而呈现出分岔衍义乃至无限衍义的特点。胡塞尔认为“无限的不完善性乃是‘物’和‘物知觉’间相互关系的不可取消的本质的一部分。如果物的意义是由物知觉的所与性决定的,那么意义必然要求这样一种不完善性,而且必然使我们诉诸可能知觉的连续统一的诸关联体,这些知觉从任何选择的方向开始,以一种系统的和严格的、规则的方式展开于无限多个方向中,即无限展开于永远被一意义统一体支配的每一方向中。”^{[6]141}直观的不同结果必然导致符号意义在某一位置上出现岔路。同时,定点的不同也会导致思维方向以及解码的程度出现差异。同样的符号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出发来进行解码,这样的表意甚至能够以无限衍义的方式进行下去。《贲》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2]109}孔颖达依据王弼的注释,将此句解释为:丘园是质素之处,非华美之所。若能施饰,每事质素,与丘园相似,“盛莫大焉”。主张为国之道,应不尚奢华。但也有其他儒者将这句话解释为装饰丘园以招募贤士,与王弼注解大相径庭^{[2]109-110}。这句充满诗意的卦辞并没有对阐释的意义结果作出严格限定。在不同的符号接收者那里,每一个解释项又会继续变成新的符号再现体,因而阐释会一直进行下去,这便形成了符号的无限衍义。“符号本身不过是一个对象,或者一个变成对象的事物,或许正在等待变成符号……”^{[11]53}最初的解码分歧可能会令此后一系列的阐释结果彼此渐行渐远。

《周易》的符号表意存在着自身的特点,其观物取象的符号建构方式以及无限衍义的表意效果都在文本中有充分体现。从符号表意的规则上看,《周易》中的元语言依然独具特色。首先,《周易》本身包含了符号阐释中的必要成分,在文本内部即规定了符号的阐释方式。《周易》的符号系统大致由卦画、卦辞和《易传》三个主

要部分构成。这三个组成部分的性质基本上可以与皮尔斯表意理论的三性相通,并与符号再现体、对象与解释项的表意三分式一一对应。按照符号解码的一般过程来说,解释者通过再现体关联到对象,并经过分析得出合理的解释项。《周易》三个部分中,卦画起到了再现体的作用,解释主体通过对卦画形象的观察进而将其关联到事物;而卦画所关联的事物又直接在卦画所配的卦辞中给出明确的表示。《易传》是结合对象的联系对符号阐释得出的结果,也确然就是符号的解释项。因此,《周易》的表意依据一般符号的阐释过程,是从卦画关联到卦辞,并在这种联系和分析中得出《易传》所要阐释的内容。也就是说,在《周易》的文本中,三个系统之间构成了完整的符号表意关系,符号的再现、对象和解释项均在同一文本中得到充分体现。可见,《周易》文本具有符码指向性,元语言的各项规则在文本中已经有了充分的规定。卦画、卦辞与《易传》之间具有表意指向的相关性,构成了释意中的一个完整闭合的意指系统,并在统一文本中得以体现。《小畜》卦卦画为巽上乾下。卦辞曰:“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2]62}从卦画的符号上可以看出,上卦为阴卦,下卦为阳卦。阳气欲上行,为阴卦所蓄止,但巽卦阴柔,不足以止物,故而只能成为小蓄之势。阴阳二气不足以相薄故不成雨,只是密云集聚于西郊之上而已。《乾》卦从八卦方位上属于西北,故云“自我西郊”。卦辞已将卦画中所指示的事物尽皆写明,关联明确。《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2]64}若风行天下,则号令可施行。今风行于天上,所以是施未行也,这便是对卦画的一种意象图解。因为行为无法实施,故君子也只能美其文德而已,这是不足取的。从中可知,《易传》的诸多解释展现了卦画所表示的意义,卦辞对象的由来原因以及卦义的寓意与社会生活的

关系,是透过直观与思考所得出的一种普遍性规律。

《周易》三个系统内部之间还可以再度分层,即出现了跨层次诠释。从整部《周易》来看,卦画系统、卦辞系统和《易传》系统构成了一个表意三分的格局。尤其是《易传》中的《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等,对《周易》符号性质与系统的建构有很详尽的解释。若从符号系统内部细分,则卦画、卦辞与《彖辞》和《象辞》联系紧密,构成了直接相关的表意三分体系。同样,卦的分层中,爻画、爻辞与《象辞》中的相关解释依然可以构成一个表意三分系统。此外《乾》《坤》二卦中的爻画、爻辞还与《易传》中的《文言》部分相参照。从元语言规则上讲,上一层系统的元语言规则必然会对下一层次表意起规约作用。也就是说,我们在考虑一卦中爻辞的意义时,在对爻画与爻辞理解的基础上,必然要结合卦画、卦辞乃至《易传》中对卦义的阐释,才能进一步推知爻画的意指。或者,在卜筮中更多的是要先理解一卦的意义,然后再深入到具体的爻画中去理解个别爻的意义。这也就表明,每一卦的意义规则乃至《周易》文本的整体结构规则必然在实际的阐释中发挥主导作用。比如,《坎》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2]134}《正义》在解释中说,六三一爻处于两卦之间。六爻的《坎》卦上卦与下卦皆是八经卦中的坎卦,也就是两个坎的叠合。六三爻处于下卦之终,正遇上面的《坎》卦,因此处于两个《坎》卦之间,因此“来之坎坎”。这也正与《坎》的卦辞中所言的“习坎”相应。可见,一爻画不可能脱离整个卦画而孤立,否则就不具备应有的意义。《周易》符号具有极强的结构性,表意的元语言规则呈现出网状的动态交织,各部分组成之间具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一特点在《周易》文本整体的元语言变化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也是《周

《易》在历史发展中可以通过无限衍义建立出不同哲学系统的根本原因。易学史上的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入文本,在符号的阐释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的论述,这些论述本身也进一步成为《周易》符号阐释的元语言规则。象数学派注重卦画符号与天文历法数理等的关系,对符号的象数意义阐释尤多,以至于阴阳消息、五行四象等理论逐渐融入了《周易》符号系统的元语言规则。义理学派关注圣人之意,在阐释中更重视符号编码者的意图定点,并建立了一套与社会伦理关系密切的元语言规则。随着学术的发展,《周易》的符号元语言规则不断积累。阐释不断进行则增强了《周易》的符码效应,并相互影响主导着符号的表意,《周易》的符号也就积淀出更加深厚的意蕴。

综上所述,阴爻和阳爻是最本质的表意符号,其他的符号组合在此基础上生成新的意义范畴。在具体的释意中,所卜问事物的具体性质会依据所卜卦画符号固有的意义范畴做自上而下的意指归类,最终结合具体的语境得出有效诠释。元语言的压力总是可以成功地将抽象符号的意义范畴与具体事物的某种特性融通一处,进而完成符号对事物发展态势的解读。与此同时,《周易》符号意图定点的确立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符号表意的片面性与诗性的表达形式造成了其文本弱编码的性质,进一步增强了无限衍义的效应。《周易》文本结构中,多层次的元语言系统也为符号的意义阐释增加了诸多复杂因素。而在实际应用中,符号意图定点的确立在充分考虑系统规则的基础上,更受到时空语境因素的限

制,以便在阐释结果的诸多可能性中找到合理的唯一解释,从而使《周易》符号解读获得了足以弥纶天地的实用性。

参考文献:

- [1]朱熹,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94.
- [2]王弼,韩康伯,孔颖达.周易正义[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9.
- [3]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二卷)[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
- [4]保罗·科布利.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M].周劲松,赵毅衡,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5]陈良运.论《周易》的符号象征[J].哲学研究,1988(3).
- [6]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1卷)[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7]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8]陈骥.文则[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9]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0]弗朗索瓦·于连.迂回与进入[M].杜小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11]约翰·迪利.符号学基础[M].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安然)